

#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

郭昭昭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医疗救助任务空前繁重。虽然绝大多数医生在沦陷前离开了南京,但是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慈善机构、隐匿身份生活在难民收容所内的军医以及参差不齐的民间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南京的医疗救助。南京内外信息交流初步恢复后,西方在宁人士又积极申请外援,经历一波三折,方才成行。上述努力为南京难民挺过难关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难民;医疗救助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1-0054-06

The medical aid for refugees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GUO Zhao-zha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Nanking, the Japanese troops made the mass murder in Nanking. The mission of medical aid in Nanking was very strenuous. Although many doctors had left Nanking before, many other people threw themselves into the medical aid, such as many foreigners, charitable institution, the army doctors who concealed in the asylums for refugees and some folk doctors. After the recovery of the information intercommunion, the foreigners in Nanking began to try their best to apply for foreign aid against some specific disease. By their hard work, the medical aid progressed smoothly. Thanks to their help, the Nanking refugees got through the difficulty.

**Key words:** Nanking Massacre; refugees; medical aid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医疗卫生事业走在全国前列。除了有金陵大学附属医院(也称鼓楼医院)、中央医院这类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还有一些慈善机构主办的诊所和一批医学知识参差不齐的民间医生。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持续导致市民伤亡,加上前线伤兵不断运抵南京,南京的医疗救助任务日趋繁重。上海沦陷后,沪宁线上的三道军事防线又被日军逐一突破,南京形势日益危急。面对紧张局势,南京医务人员陆续西迁,使应接不暇的医疗救助事务更加繁重。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随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混乱局面全面来临并长时间延续。此时的南京,外科伤员人数激增,传染病有兴起之势,加上传统的生老病死,南京的

医疗救助任务空前繁重。

面对空前繁重的医疗救助任务,占领南京的日军上海派遣军置之不理。即便个别官兵对难民表示出一丝同情,也被高级将领严词拒绝。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12月21日日记记载“军医部长来此,他说在南京征缴了大量的卫生材料。另外,他建议说,让我军队为当地人进行诊疗,这是为了部队防疫,并不带有宣传和安抚之意。好像完全本末倒置了,因此要求他用剩余的力量做这事。”<sup>①</sup>

<sup>①</sup>《饭沼守日记》,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不过,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由几位西方人士维系的金陵大学医院在正常运转,脱下军装的军医隐匿身份为安全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慈善机构积极施药施医,一批医学知识参差不齐的民间医生也积极奉献。南京内外信息交流初步恢复后,西方在宁人士又积极申请外援,外援医生2月下旬抵达南京后第一时间投入医疗救助。在各类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危急时刻的南京医疗救助勉强得以维系并且超负荷运转,为南京难民渡过难关做出了突出贡献。学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较多关注日军南京暴行,对于和难民生活紧密关联的医疗救助问题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本文将做出努力,以求教于学界。

### 一、西方在宁人士的努力

南京沦陷后,有几位美国人<sup>①</sup>留守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这是当时南京唯一能进行全面医疗救助的医院。具体来说,有威尔逊和特里默领导的几名医生,有伊娃·海因兹领导的几十名护士,有支持手术的检验设备和医疗设施,有麦克伦精细化的行政管理及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和安全区委员会的全力支持。其实,金陵大学医院、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和安全区委员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一般,它们的人员部分重合,因此工作衔接非常顺利。如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秘书福斯特1938年1月12日给妻子的信记载“昨天上午,我忙着把医疗用品送进大学医院。当医疗卫生部在我们仍在下关时,给了我们许多医疗用品。我们把它们带进了城,现在都送往医院,因为我们用不着。”<sup>②</sup>他们的合作还有很多的体现,如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于日军进城前在军政部和外交部设置难民医院,日军进城后,制止医护人员入内进行医疗救助。无奈之际,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只能在鼓楼医院内设难民医院。据沦陷时滞留在南京的军医蒋公毅1938年1月5日日记载“鼓楼医院内附设的难民医院,为美侨梅奇牧师所主持。事前处长曾几度与之接洽,欲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同时他又受市政府的嘱托,成立国际性的医院,以便作为一般受伤军民医治及避难的处所,故当十二(即12月12日)那一天,梅奇牧师即实行前议,接收外交部祁院长,无如又被敌人赶走,乃不得已附设在鼓楼医院内,地点较为安全。”<sup>③</sup>

对于这一设在鼓楼医院内的难民医院,也有其它资料互证。据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马吉<sup>④</sup>1937年12月20日给妻子的信记载“日本兵捡起一个带有铜烟锅的长烟杆狠狠地砸在老董的头上,当我到那儿时,地上还有许多血,他的脸上也是血,头上缠着止血的毛巾,我把他带到急救医院,这个医院是我用手头的基金在金陵大学医院后面开设的。”<sup>⑤</sup>

对于三者之间的互动协调,国际救济委员会(原为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改为国际救济委员会)给予了充分的评价。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记载:

南京人民所可引以为幸者,即鼓楼医院之排除万难,继续工作;南京万国红十字会,于完成伤兵临时服务之后,转移其力量于发展贫病者之医药工作,对鼓楼医院一部分之病人,与以费用上之协助。故本会所认为必须补充之工作,已在该会主持之下,妥善进行,而本会在医药方面之工作,只须与人合作,无须直接参加矣。红十字会及鼓楼医院对人员、经费及供给上之需要,既由本会与以援助,并由本会代为吁请各界,予以援助。本会与鼓楼医院约定,将贫病者移送该院,有时由本会捐助现金,以供医药服务上之需要,或由本会代付病人之医药费<sup>⑥</sup>。

在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和安全区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金陵大学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助各类伤员。除了应对常规病种,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外科伤员急救上。据拉贝任命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1937年12月17日日记载“医院迅速塞满日军残忍和兽性的牺牲品。威尔逊,威尔逊,我们唯一的医生,手肿了还得工作到夜深。”<sup>⑦</sup>对此,很多幸存者也有着清晰的回忆,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孙庆有口述“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着也哭了,她才16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

<sup>①</sup>主要有威尔逊(Robert O. Wilson)、特里默(C. S. Trimmer,又有翻译成德利谟)、伊娃·海因兹(Iva Hynds)和麦卡伦(James H. McCallum,也有翻译成麦考伦、麦加伦、詹姆斯·麦卡勒姆,中文名为麦克伦)。

<sup>②</sup>《福斯特致妻子函》,章开沅等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sup>③</sup>《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sup>④</sup>英文名John G. Magee,也有翻译成梅奇、马约翰、马冀、麦琪。

<sup>⑤</sup>《马吉致妻子函》,章开沅等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155页。

<sup>⑥</sup>《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sup>⑦</sup>《费吴生日记》,章开沅等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73页。

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sup>①</sup>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沙官朝口述“回到难民区以后,伤口疼得不得了,我妻子看了很着急,搀架着我到了鼓楼医院,医生看后要我住院治疗。我住院住了 11 天,记得睡的是 267 号病床。住在那里也并不安稳,因日军要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我,不能说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说是轰炸受的伤。”<sup>②</sup>

除了救治外科伤员,金陵大学医院医护人员还要应对女性的“强奸后遗症”——性病和流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虽然很多受害难民不愿声张此事,但还是有不少资料记载。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 1937 年 12 月 23 日日记载“今日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踏(踢),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可恨!”<sup>③</sup>与此互证的是,1938 年 2 月 13 日贝德士在致妻子的信中也记载“如今,长期以来可预见的问题出现了。今天一个妇女带着她的女儿到了大学,要求让这个怀孕的女孩流产以终止妊娠,这就是日军强奸的后果。”<sup>④</sup>除了流产,更为麻烦的是性病。据 1938 年 2 月 17 日《南京救济形势》记载“遭到强奸女性可能会感染性病,这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人们希望我们能够迅速扩展足够的诊所服务来治疗性病,并且希望能够得到免费治疗。”<sup>⑤</sup>

除了做好医疗救助的本职工作之外,金陵大学医院医护人员还要为病员的衣食起居操心。对于正在治疗的病人,医院要考虑他们的吃饭和居住,此项工作同样由麦卡伦承担,他付出了空前的努力。据麦卡伦 1938 年 1 月 7 日写给外界的信中记载“我们感到奉献了良好的服务。……没有缺过他们一顿饭,在停电、停水的时候,我们悄悄地进行紧急发电和供给。为了出资维持和供给,我们的财源和存货都跌落到最低点。坦白地说,我本人几次领着盗匪外出,有时候为维持医院也进行某种抢劫。”<sup>⑥</sup>这段时间的病员都是难民身份,即使治愈,也无家可归,只能由麦卡伦将其送往难民收容所。据麦卡伦 1937 年 12 月 29 日给家人的信记载“我必须把一些病人用救护车送回家,任何人回家都必须有一个外国人陪伴。我甚至是警察的官方警卫。”<sup>⑦</sup>

由于连日劳累,金陵大学医院的医生也陆续病倒。1937 年 12 月下旬,内科医生特里默生病了。据拉贝 1937 年 12 月 26 日日记载“刘和他的一个孩子病了,我开车把他们送到鼓楼医院的威尔逊大夫那儿,他目前一个人负责全院的工作,因为特里默大夫也病了。威尔逊大夫又给我看了一起日本士兵的新的暴行。”<sup>⑧</sup>由于过度疲劳,1938 年 1 月底,外科医生威尔逊也病了。据

1938 年 1 月 29 日拉贝日记附录的斯迈斯给博因顿的电报记载“威尔逊大夫颈部得了病,因此南京目前就没有外科医生了。”<sup>⑨</sup>总之,这段时间,金陵大学医院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 二、慈善机构、军医及民间医生的参与

此时的南京,除了金陵大学医院在超负荷运转,南京的慈善机构也积极参与南京的医疗救助。崇善堂即是其中之一。据《崇善堂埋尸等活动状况》记载“本堂自入难民区之后,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救济难民食米,五月以后,时办时停。二十七年一月六日将施诊所移入难民区,为难民治病,迄今照办。一月二十三日办掩埋工作,三月二十九日停办。”<sup>⑩</sup>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其中之一。据《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节录》记载“南京下关一带为受兵灾最惨之地,故难民染病者实无力就医,本分会爰在下关设立施诊所一处,内分内科及外科二项,内科系用中医中药,外科则用西医西药。每日就诊者内科以肠胃病居多数,外科则十九为皮肤病,此全系因难民环境不良,不知注重卫生所致。唯南京在事变之后,药物原料非常缺乏,当此夏令疫

①《孙庆有口述》,张连红、张生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上册,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5 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6 页。

②《沙官朝口述》,张连红、张生编《幸存者调查口述》上册,第 19 页。

③《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 21 页。

④《贝德士致妻子》,张生编《耶鲁文献》上册,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69 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3 页。

⑤《南京救济形势》,张生编《耶鲁文献》下册,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70 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1 页。

⑥《麦卡伦的信件》,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 151—152 页。

⑦《麦克伦宣誓证词:麦克伦日记》(书证第 309 号),张生、杨夏鸣编《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71 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4 页。

⑧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1、532 页。

⑩《崇善堂埋尸等活动状况》,孙宅巍编《遇难者的尸体掩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5 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5 页。

病将盛行之际,有医无药,殊为可忧之事焉。”<sup>①</sup>红卍字会在开设粥厂的同时,也开设了难民医院。因为红卍字会曾经参与过东京大地震救助。八一三事变后,出于人道主义,为日军飞行员收尸并无差别地进行安葬。南京沦陷后,日军海军司令等高层特来表示感谢,所以红卍字会的医疗救助工作开展较为便利,在开办难民粥厂的同时,也为难民的医疗救助做出了突出贡献。据《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民国26年至34年慈业工作报告书节录》:“兵燹之后,疫疠丛生,公私医院诊所,均未恢复,患病之人,无处治疗,本会特设施诊所两处,专治内外各科,施医给药,以济贫民。每所逐日施诊医药,总在二三百人,总计治愈人数,共达六万余人。历时八月,公私医院,多复原状,本会诊所,亦告结束。”<sup>②</sup>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红卍字会设置的医疗诊所内,还潜伏着一支特殊的医疗队伍,这就是留在南京的军医。据沦陷时滞留南京的军官祝晴川在《丁丑南京屠城记》中记载“就副会长陈冠麟对笔者介绍:……在本月13日前,我后方之医务人员带着器材药品没有退出挹江门者大都化装潜藏在难民区,曾来会要求收容。他们愿帮助救济难民,已将他们以红卍字分会会诊所的名义,分布在难民区中各大收容所附近。城陷以来急救、抢救、接生日有数起,嘱笔者注意要保护好这批医务人员。陈并提醒千万当心那位孙叔荣处长。”<sup>③</sup>

军医属于军队序列,战时必须执行军令,军队坚守一天,军医就不能撤离。1937年12月初,战局日趋紧张,随军军医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部署,交由懂德语的金诵盘大夫统一领导,有与安全区委员会对接之意,因为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是德国人。对于金大夫领导的这支队伍,军医蒋公毅的日记有系统的记录。据蒋公毅1937年12月1日日记载“十二月一日前方战事已逼近首都外围,我们在金处长诵盘领导之下,紧张地计划着保卫首都的一切救护工作。”<sup>④</sup>同日日记还记载“军事委员会卫生勤务部刘部长偕全体部属于今晚离京赴汉。临行本允许处长代理部务以便统一指挥留京各卫生单位,后复改为留京处理部务。据闻这是经过部里的秘书考虑过的,事前我们毫无所知。不仅觉得奇突,而且有些滑稽,但处长似乎有了决心,处之泰然。”<sup>⑤</sup>

从蒋公毅日记可以看出金诵盘处长是个负责的、民族气节浓厚的军医,上任后全力整合军医救助伤兵。在战事吃紧之时,为统一伤兵救助,金诵盘处长将各地伤兵和军医院集合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军政部办公大楼内,合并收容治疗。据蒋公毅1937年12月9日日记载“每天都有成千的伤兵(陆)续的由城南运送进城,处长因为医院分散在各地,不便于收容;且分院在八府塘已遭到了敌弹的轰炸,决令各医院集合在外交部及军政

部二处,把职务划分开来合并收容,这样更可减少很多的麻烦。”<sup>⑥</sup>

1937年12月9日,日军兵临城下,由于军人的身份,也必须考虑自身的安危。金诵盘主动前往安全区委员会,商谈应急处理办法。这次会面,双方都有记载。据蒋公毅1937年12月11日日记载“处长因感觉到情形既然这样严重,重伤的士兵,实在无法可以尽量运送过江了,乃于下午二时,亲赴国际救济委员会,向该会主席德侨拉贝氏提议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冀其收容重伤官兵,俾他们可以安全住院。”<sup>⑦</sup>对此,拉贝的日记也有记录。据拉贝1937年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金大夫想把重伤员安置到我们安全区来。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我告诉金大夫去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他是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方面的负责人。根据金大夫的说法,他能提供80名中国医生。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南京还有这么多的医生。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sup>⑧</sup>

双方的记载在时间上有差距,蒋公毅记的是11日,拉贝记的是10日,显然,应以当事人拉贝的记载为准。通过双方日记可以看出二者的商谈是开诚布公的,拉贝没有推脱责任之意。特别是得知金大夫能提供80名医生,拉贝非常高兴,因此建议金大夫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这时,两股医疗力量有合流之势。但是因为军医身份特殊,南京沦陷后不能随意出现以防暴露身份,因此以后以红卍字分会诊所为平台,分布在难民区各大收容所内,服务南京难民的医疗救助。

危急时刻是人道主义发扬的最好舞台。人道主义施展的主体很多,有专业的组织,有个体的行为。除了金陵大学医院和慈善机构,在南京沦陷后最危难的日子里,南京也有很多自发的医疗救助在默默开展。此时几十万难民中还有一些医学知识参差不齐的医生,这些人无从统计,所做工作也难以量化。如在金陵大学附中的难民收容所,在所长姜正云的主持下,设置了医务所,由难民内

<sup>①</sup>《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关于难民救济工作概况节录》,孙宅巍编《遇难者的尸体掩埋》,第177页。

<sup>②</sup>《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民国26年至34年慈业工作报告书节录》,孙宅巍编《遇难者的尸体掩埋》,第75页。

<sup>③</sup>《丁丑南京屠城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475页。

<sup>④⑤⑥⑦</sup>《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49、50、56、58页。

<sup>⑧</sup>(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59页。

懂医学的人负责。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管理人员程瑞芳女士更是冲在医疗救助第一线。据程瑞芳 1938 年 2 月 22 日日记载“病人真多,现在我又看病了,因为这些人来找我,没有法子。叫他们到医院去,不去,有的不能起床,怎能叫他走,除非抬他。”<sup>①</sup>总之,在人道主义的引导下,各类医疗资源有力整合,服务沦陷后南京的医疗救助。

### 三、外援的进入

由于难民生活在安全区,其中好几万难民集中生活在难民收容所,冬春交际,各类传染病有爆发的危险。1938 年 1 月,安全区难民收容所就发现了白喉患者,据程瑞芳 1938 年 1 月 10 日日记载“有一小孩发白喉症,医院不收,我只好搬他在五百号后面洗衣房内,没有法子,……发白喉症的小孩死了,他的妹也死了,一共死了十五个小孩,四个大人,两个老年人,两个中年人。”<sup>②</sup>程瑞芳既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管理者,也粗识医学,对这一病例的隔离处理显然是冷静的。

到了 1938 年 1 月底和 2 月初,虽然陆续有难民离开,但还有三分之二的难民生活在安全区。据拉贝 1938 年 2 月 6 日日记载“现已有三分之一的难民撤走,但是他们仍迫切需要帮助。”<sup>③</sup>到了 2 月中下旬,接近一半的难民离开了安全区,此时春天已经来临,防疫形势更加严峻。继出现白喉病以后,其它常见传染病也时有出现,如麻疹、猩红热和流感。这时大家最担心的是天花的爆发,为此,给难民种牛痘是当务之急。

面对严重的防疫形势,西方在宁人士一边支撑金陵大学医院运转,一边联系外界医生和药品援助南京。南京沦陷后,南京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平台被破坏了,向上海发送有效信息极为困难。1938 年 1 月初,随着欧美使领馆官员回归南京、电力恢复后无线电系统的使用以及穿梭在长江上的欧美舰船的呼应,“南京——上海——世界”信息平台初步搭建,这时安全区委员会、大学医院纷纷向外界伸出求援之手。

对外求援的过程是曲折的。鉴于严重的防疫形势,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在美国大使馆官员回归后就给上海拍电报请求援助。据史迈士 1938 年 1 月 9 日给家人的信记载“两周来,食品一直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还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给冯秘书的电报中,我们还要求来两名外国医生和两名外国护士。我们想更多地开展医疗工作,在难民营建立流动医疗站。”<sup>④</sup>在请求医务人员支援南京的同时,安全区委员会也积极向上海申请药品援助。据拉贝 1938 年 1 月 21 日附录史迈士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的电报记载“请于 23 日(星期日)用英国炮艇运 1000 磅鱼肝油(大包装)和 200 磅包

扎用药棉到大学医院。请敦促无论如何把 1 月 10 日在国际药房预订的 20 万单位白喉血清也一并送来。”<sup>⑤</sup>因为鱼肝油可以用来增强肺病病人的体质,抗毒血清可以用来治疗初步抬头的传染病白喉。

此时日军对南京的人员和物资进出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外界医疗人员和药品一时难以进入南京。但是,日方对西方在宁人士的持续呼吁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提出让日本医生参与医疗救助,以敷衍西方在宁人士。据拉贝 1938 年 1 月 22 日日记载“关于我们为上海和香港来这里来的医生申请通行证一事,刚才日本方面来消息说,他们愿意为我们给美国的鼓楼医院提供两名日本医生。我估计这项提议立刻就会遭到美国大使馆的拒绝。”<sup>⑥</sup>

此事拖了很久,在西方在宁人士的一再申请下,日方才允许外籍医生进驻南京。第一位到达南京的医生是布雷迪,他在 1938 年 2 月 21 日抵达南京后,即开始了疫苗接种。据魏特琳 1938 年 2 月 25 日日记载“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工作从下午 2 时开始,持续到 5 时 20 分,共为 1117 人接种了疫苗。布雷迪医生和 3 名助手承担了这一工作,地点是在户外的阳光下(南面的宿舍之间)。”<sup>⑦</sup>种牛痘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成年人就对此表示出不理解,拒绝接种,只能对其做说服工作。据程瑞芳 1938 年 2 月 26 日日记载“今下午种牛痘,八百多人,明日再来。天气好,人多,只能在院子种,次序很好。有的地方人不肯种,医生六点钟就去难(拦)着大门,不让人出去,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中国人只知小孩种牛痘,大人那(哪)有种的。因这一班人没有受教育的,我们这边的人先讲给他们听。”<sup>⑧</sup>

由于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还是取得了成效。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记载“难民中一般的死亡率虽高(儿童尤甚),然尚无严重病症之流行。……一九三八年春季收容所之防疫运动中,种痘者共为 16265 人,注射伤寒霍乱预防针者,共在 12000 人以上。”<sup>⑨</sup>

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成效,麻疹、猩红热、流感天花之类的传染病没有爆发。不过有一种病有蔓延之势,这就

①②③《程瑞芳日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 44、31、45—46 页。

④⑤⑥(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 589、474、475 页。

④《史迈士致家人函》章开沅等编《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 272 页。

⑦(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2 页。

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第 406 页。

是脚气病。脚气病不同于脚气,它不是传染病,但对病人身体伤害极大。在2月初就发现有脚气病患者。据拉贝1938年2月5日日记载“今天,鼓楼医院的医生传来消息说,已有两个患脚气病的病人送进医院。这对只以大米充饥的单一营养者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已电告上海求购药品。”<sup>①</sup>得知这一病例出现时,安全区总干事菲奇正在上海出差,于是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及时给菲奇拍电报,建议其购买治疗脚气的药品和食品:维生素B1和蚕豆。据拉贝1938年2月6日附录的史迈士致上海出差的菲奇的电报记载“已发现多例脚气病病例,请尽快向医院寄发10加仑维生素B药水(我们强调的是维生素B1),另加60毫升白喉抗毒血清素——这两种药请优先供给卫生署。医生建议用大豆作预防食品,请用‘瓦胡’号船运100袋蚕豆来。如缺货,请设法筹办一大部分。”<sup>②</sup>菲奇按照电报要求在上海买好了蚕豆,于1938年2月12日回到了南京,等待食品、药品的运进。

此时在日军的监视下办成一件事非常的困难,申请医生来南京用时一个多月。这次100吨蚕豆的运输和发放又遭遇日军的阻拦。首先日方借口不知道南京出现了脚气病。据拉贝1938年2月14日日记载“日本人声称,他们对南京的脚气病一无所知,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的健康状况。”<sup>③</sup>其次,日方要求蚕豆应由日军控制的自治委员会在安全区外发放。安全区委员会一再声称这是大学医院的独立工作,理应由金陵大学医院的威尔逊医生监督发放。其实日方非常清楚安全区委员会、大学医院和国际红十字会的重合关系,对此不容商议。随后,安全区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在其中斡旋,私下也与自治委员会沟通2天后,斡旋有了初步结果。据拉贝1938年2月16日日记载“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带来消息说,‘蚕豆问题’已获解决,已准许运进蚕豆,既可以在安全区内也可以在安全区外予以分发。”<sup>④</sup>其后又是一波三折,直到2月下旬才将蚕豆问题解决。

西方在宁人士积极申请外援起于1938年1月初,到了2月下旬才有眉目并陆续成行,这与南京治安大环境的转变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到了1938年2月初,南京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2月中旬,东京将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等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高级将领调回国,换上了畑俊六大将。畑俊六上任后,切实整顿南京秩序,南京治安整体好转。2月25日,南京城门允许市民自由出入,南京“常态化”殖民秩序开始了系统创设。也就在这段时间,西方在宁人士一再申请的医疗人员和药品方才陆续到达南京,开始了沦陷后南京医疗救助的接力。

#### 四、结语

南京沦陷后,面对繁重的医疗救助任务,西方在宁人

士、慈善机构、难民收容所里隐瞒身份的军医以及留在南京的民间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危急时刻的南京医疗救助,为南京难民挺过极端困难的时期做出了贡献。

相反,统治南京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对南京难民的医疗救助置之不理。由于种种原因<sup>⑤</sup>,日本大本营于1938年2月18日下令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等建制,上述各部统一整编为华中派遣军,由畑俊六任司令官。原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改称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由原田熊吉任特务机关长。新领导班子开始因势利导的建立华中伪政权,构建南京“常态化”殖民秩序,全面推进“被统治者承认统治者统治,统治者允许被统治者生存”的共同体建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方也开始参与南京市民的医疗救助,特别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在藤田部队及天谷支队军医部和军队医院的支援下,制订了实行广泛防疫和医疗的计划。日军也派医生到区公所参与难民治疗。1937年2月27日、28日日军在各区设立医疗所,定于3月上旬全面实施免费医疗。据南京宣抚班3月份情况报告:

第一区公所:自1月以后,派遣支那人医生两名、支那人护士两名、支那人药剂师两名,共计六人,实施免费医疗。第一区公所自3月以后增加一名日本医生进行援助(目前没有工资)。……第二、第三、第四区公所自3月上旬开始开设了日军诊疗所,进行免费医疗。另一方面,药材等不够充足,正在使用敌产品。考虑到这是个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城市,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sup>⑥</sup>。

不过,对于全城难民的医疗救助,考虑到这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方也意识到“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精力,日方都不会全力投入,南京的医疗救助依然只能在人道主义的维系下,通过各类群体的努力,共同推进。

作者简介:郭昭昭(1982—),男,安徽合肥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sup>①②③④</sup>(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586、589、648—649、661页。

<sup>⑤</sup>见郭昭昭《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生活秩序变迁研究(1937.7—1938.4)》,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sup>⑥</sup>《南京宣抚班报告》,王卫星、雷国山编《日军军方文件》,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1册,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